

影响当今中国
发展进程的人

之五

中国 高层智囊

张晓霞/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晓霞 / 著

中国 高层智囊

图书代号: SK1843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高层智囊. 5/张晓霞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3

ISBN 7-5613-2181-3

I. 中… II. 张… III. 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23 号

责任编辑: 周宏

中国高层智囊

——影响当今中国发展进程的人之五

张晓霞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南郊吴家坟 邮政编码: 710062)

北京市黄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2001年4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印张 字数: 24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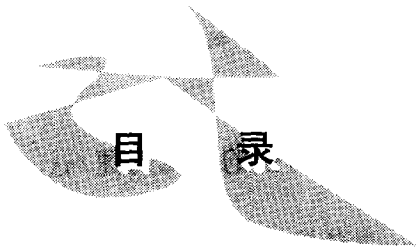
定价: 19.80元

ISBN 7-5613-2181-3/C·32

开户行: 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帐号: 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问题, 请与发行科联系、调换

电话: (029)5251046(传真) 5233753 5307864



目 录

董辅弼：为所有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的元老级人物/1

漂泊

武大骄子

孙冶方遇见千里马

成为孙冶方“八大干将”之一

耸人听闻的“两个分离”

希拉克要见董辅弼

“温州模式”的反思

“三明治经济”“飞去来器经济”与“产业空洞化”

从在美国的奇特经历看中国购物风险

令人忧心的国企改革

向吴敬琏叫板

附：市场经济中防止官员腐败问题

李肇星：中国外交界的鸽心鹰爪/47

农家少年的文学梦

岳父曾是刘少奇秘书

邦联制不适于两岸

笔战赫尔姆斯

非常时刻与北京高层保持紧密联系

推销中国

力驳“中国威胁论”，揭露“人权卫士”假嘴脸

永怀青春中国

路甬祥：追逐未来科技的生死时速/75

少年立志

浙江大学：科技探奥路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归国前后

构建国家创新体系

寻求最有意义的合作

警示：21 世纪的 12 大挑战

王绍光：影响内陆开发决策的灵魂人物/91

一部力作：《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与胡鞍钢“一见钟情”

引起争议的“分权”观

反思“地区不平衡”

为开发内陆地区献策

附：变化的政府作用

张曙光：寻找通往繁荣的必由之路/117

乐天派的三个“遗憾”

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

最贴近生活的经济学家

凯恩斯主义像只怪兽

从天则看“第三部门”的成长

产权新思维

与王绍光、胡鞍钢辩论

王海事件的经济学道理

附：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与何清涟对决

王小东：网络时代的中国新民族主义悍将/161

批驳《河殇》被诬为王震“授意”

1999年的王小东事件

一份令人深思的调查问卷

我为什么非要搞出个“民族主义”

警示：信息时代国家的自我淘汰

不断遭到非议

何家栋也不放过王小东

附：激情的阴影——评电视系列片《河殇》

张维迎：“学而优则商”的首倡人/199

最早研究企业家的学者

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

“契约理论”轰动学界

重塑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成长之路

附：从现代企业理论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王逸舟：在动荡与冰冷的世界舞蹈/227

一个神秘的人

轰炸警世录

尘埃落定的思索

多极化的欲求与单极化的现实

感受复杂的多边关系

警惕后叶利钦时代的政治倾向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外交和国家安全

附：国家强盛才有国家安全

杜润生：毛泽东眼中的好同志/263

传奇的革命经历

毛泽东说：杜某是个好同志

十二年科学规划的重要智囊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

主持起草《科学十四条》

科学院第一个被打倒的人

向邓小平进言

小城镇思路中的大战略

附：解读温州经济模式

陈元：盘活中国银元的“金融大亨”/301

从技术员到研究生

走上仕途

令人耳目一新的陈元理论

将门虎子

西部的财神

董辅弼：

为所有制改革提供

理论支持的元老级人物

漂泊

1927年7月26日，董辅初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一个普通职员家庭。他的祖父虽生长在农村，可却是远近闻名的乡贤，青年时离家到城里做店员，良好的工作环境使他略通英文。董辅初的外祖父也在外商轮船上工作过，是个见多识广的人。祖父、外祖父的智慧和儒雅使董辅初的父亲董浚敏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董浚敏长大后来到上海读书，后来到宁波三北轮船公司工作。他喜欢诗词书画、古玩，情趣十分高雅。

董辅初的家庭和睦、快乐、平等，他受到来自祖辈和父辈的双重熏陶，在他们家常常是父亲吟诗诵句，母亲洗手焚香奏古琴，气氛其乐融融。

董辅初父亲的藏书很丰，西方的、东方的、古典的、现代的，应有尽有。于是董辅初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并且深受西方进步文化的浸染，这在封建制度的旧中国真是难能可贵。

董辅初：为所有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的元老级人物

董辅初从童年起就经历了漂泊不定的生活。他6岁启蒙，10岁时抗日战争爆发，宁波处在日军的炮火中，于是举家西移。当时入川的各个通道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董辅初的家人就夹在这群人群中，好在董浚敏在轮船公司做事，他们一家坐着船，先到宜宾，经过十多天的漂泊，最后在重庆安顿下来。

董辅初一家漂泊到重庆，衣食无着，父母亲只得靠替人家做零活为生，后来才在一家公司找到一份工作。

董辅初就读于重庆西郊永川原国立16中学。年纪尚小的他除了发愤读书外，对时局甚为关心。有一次他放学回家恳求父母替他订一份《新华日报》。父亲对他说那是大人看的报纸。董辅初说，关心抗战怎可分大人小孩，再说，我已经长大了。父亲看着懂事的儿子，为他订了《新华日报》等3份报纸。董辅初每天课外和放学后，最大的兴趣就是阅读报纸。两年下来，科学救国的强国志愿深深扎根在他的心中。他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

董辅初的家附近有一家生产皮鞋底的小工厂，工厂里的工人与董辅初很熟悉，他们经常向董辅初借阅报纸。频繁的相处，使董辅初对工人们很有感情，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时政，全民族同仇敌忾的社会气氛，强烈地激励着少年时代的董辅初，这段不平常的生活经历初步培养了董辅初忧国忧民的好品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18岁的董辅初随父母迁往武汉。

武大骄子

1946年，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招考，报名者有3000人，只录取60名，董辅弼凭着他的扎实的基础，过硬的知识，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

武汉大学是所百年老校，师资力量十分雄厚，尤其是经济学教学力量在全国出类拔萃。董辅弼日后能成为我国著名的经济专家与在武汉大学的学习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董辅弼的经济学老师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张培刚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四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后来结集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因最早从历史和理论上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被列入《哈佛经济丛书》在全球发行，成为多个国家大学经济教学的必读参考书。然而在50年代，张培刚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他甚至被迫离开了讲台，当上了管后勤基建的总务长。曾有一位外国经济学家慕名来中国寻找张培刚，可是问了好多人，竟没有一个知道叫张培刚的经济学家，这位外国专家很是惊讶和失望。就在这位外国专家将要离开中国时，有人告诉他，张培刚找到了，现在武汉大学校搞基建，离开了讲台和学术研究，已没有著作向他推荐的了。外国专家听了心里很难过，他说中国经济落后的根子就在这里了。

董辅初：为所有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的元老级人物

勤奋好学的董辅初师从张培刚，是他一生的幸运。张培刚不但在课堂上诲人不倦，课余总喜欢给董辅初这个特殊的学生开小灶。他认为董辅初不但聪明伶俐，思维开阔，勤奋好学，而且为人宽厚真诚，作风严谨踏实，是一块经济学家的好料子。他给董辅初讲了很多当时课堂上无法涉及的经济理论，讲了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及振兴中国经济的一些异乎常论的观点和想法。他们还在一起讨论人生和理想，师友交谊，可见一斑。

董辅初入武大不久，就与班上的同学组成了一个“求真读书会”，他们在一起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同学，在读书会上读日文版的《资本论》和由香港秘密传人的薛暮桥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后来他们办起了墙报，董辅初的《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在墙报上发表后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这可以说是董辅初的经济学处女作。

“求真读书会”对董辅初的影响很大，从此使他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董辅初在武大还受到杨端六、刘秉麟、李剑农、戴铭巽、周新民等老师的教诲，这些都使他念念不忘。

1949年董辅初的考试成绩为法学院政治、经济、法律三大系的第一名，是当时获得院级奖学金的惟一学生。人称他是武大的骄子。

董辅初在大学期间，除了勤奋攻读外，还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参加社会活动。

1947年5月20日，武汉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的“5·20学生运动”，董辅初参加了游行，还在墙报上发表讽刺反动当局的漫画。同年6月1日发生了国民党当局镇压武汉大学学生运动的惨案，学校取消了暑假前的考试，一些同学回家了，一些人钻进了书斋，董辅初却在学校里组织进步活动。他参加了以鲁迅著作

命名的进步社团“热风社”，和同学们一起读进步书刊，讨论时事。

1948年7月，董辅初参加了我党在武汉大学的秘密外围组织“学工组”（学生运动工作组的简称），接受任务后回班里组织歌咏、戏剧、读书等进步活动，配合我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斗争。

1949年1月，全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武汉市的相应组织叫做“新民主主义青年社”），董辅初同原来的“学工组”成员们一起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成员，仍然在班内从事秘密的学生运动。武汉市解放前夕，国民党准备把“武大”迁至台湾，局势异常紧张，董辅初被调到学校的安全互助团工作，这是武汉大学师生员工反对国民党搬迁、保护学校的公开组织。董辅初实际上领导着警卫组，组织师生员工站岗巡夜，保护学校。国民党当局对进步的师生员工恨之入骨，拟就了黑名单，企图屠杀他们。一些学生被吓走了，董辅初等仍然坚持在岗位上。

1949年5月初，经过长期考验的董辅初被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党组织吸收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那年董辅初22岁。一个星期后，武汉市迎了解放后的第一个黎明。在武汉市迎接解放群众大会上，董辅初代表武汉市学生界致欢迎辞，这是董辅初一生中永志难忘的一页。

同年，董辅初当选为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并以学生代表的资格成为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

关于武汉大学4年的学习经历，董辅初曾经总结道：“在武汉大学经济系，除了一年级算是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外，其余3年我都把大部分时间用于从事学生运动和解放后的学生工作，真正用于学习经济学的时间是很少很少的。尽管如此，在大学的4年中学到的东西，对我来说，仍是终身受用的。”

董辅初：为所有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的元老级人物

孙冶方遇见千里马

1952年，董辅初作为被保送留学苏联的学生而赴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学习。第二年他就读于苏联最著名的经济学府——莫斯科国立经济研究院。曾在中国讲学的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布列也夫被学校指定为董辅初的辅导老师。

在布列也夫的指导下，董辅初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并学习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这为他后来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上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董辅初的另一位导师图列茨基，是一位研究价格和国民经济平衡问题的专家，他对国民经济的独特理解，使董辅初真正进入了经济学最本质的领域。

董辅初在苏联的学习成绩得到苏联经济学教授的首肯，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经济学家苗子。

1956年夏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率领一个代表团到苏联访问，访问时孙冶方要在莫斯科经济学留学生中挑选两个翻译，国立经济研究院老师毫不犹豫把董辅初推荐给了孙冶方。

董辅初听说过孙冶方的大名，却是第一次见面，心情非常激动。他出色的俄语翻译水平，谦逊的为人，让孙冶方眼睛一亮。孙冶方询问了董辅初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还饶有兴趣地和他讨论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两人十分投机，孙冶方离开苏联时，对董辅初说，我看到了未来中国经济的希望，因为有你们。

1957年，董辅弼以题为《苏联和中国的国民收入》的洋洋20万字长篇论文通过毕业答辩，获得了苏联副博士学位。

《苏联和中国的国民收入》搜集了对苏联来说都是极为难得、极为丰富而系统的资料，进行了许多被导师誉为“新颖独特”的分析，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该书1959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董辅弼的第一本书，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著作。

1957年，董辅弼学成归国，回到武汉大学任教并晋升为讲师，这一年他与贤淑、文雅的大学女校友——武汉大学医学院的刘蔼年结婚。

1949年的7月份，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18岁的刘蔼年考入了武汉大学医学院。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武汉姑娘，长得小巧秀气，性格文静大方。刘蔼年的父亲是一位做杂料的生意人，在抗战期间病故了。刘蔼年在懿训中学读完了全部的中学课程。那是一所教会学校，学生除了学习科学知识外，可以更多地受到一些平等、博爱的宗教思想的启示，这种教育在刘蔼年的性格和教养方面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自从孙冶方从苏联考察回国后，一直没有忘记董辅弼，并有心想调董辅弼到北京工作。

1958年上半年，已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邀请苏联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司司长、著名经济学家索波里到中国系统讲授国民经济平衡问题时，指名借调董辅弼到北京帮助工作。

董辅弼没有让孙冶方失望，他在接待、翻译及资料整理、汇集等方面的出色表现再次让孙冶方喜上眉梢，孙冶方决定正式请调董辅弼到自己身边工作。

1959年2月，在孙冶方的努力下，董辅弼被调入中国科学

董辅初：为所有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的元老级人物

院经济研究所，并被任命为平衡组的副组长。

董辅初成为专职的经济研究人员后，工作干劲十足，在研究了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平衡等问题时，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文章，引起了国外理论界的关注。最突出的成果是对马克思再生产公式的具体化。日本立命馆大学在《立命馆经济》上全文翻译了董辅初的文章。法国学术界通过本国驻华使馆请我国提供法文译本。日本学者山名正孝在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成长理论》的文章中称董辅初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

董辅初研究的再生产公式及其表式合称“董氏模型”，是当今世界和我国流行的各种再生产模型中最符合马克思经济学再生产原理的一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曾称“董氏模型远远超过苏联迄今为止的模型”。台湾学者钱元亨称董辅初和另一位经济学家刘国光是“目前中国经济学术界的佼佼者”。

董辅初认为，国民经济平衡理论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必要条件，它的哲学基础是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运动和平衡的统一，因此保持平衡是经济正常运动的前提和条件。国民经济平衡关系最基本的是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平衡，社会主义经济的平衡发展关键在于要有反馈机制，市场机制就是一种灵敏而有效的反馈机制。国民经济结构合理化是实现国民经济平衡的根本保证，急躁冒进，尤其是过快过急地发展重工业都是失衡的根源。

董辅初的这些理论，新颖独特，深刻务实，得到了孙冶方的高度赞誉。

成为孙冶方“八大干将”之一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问题的决定》（草案），文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在这个文件的指导下，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的“四清”对象设在河北省的昌黎。董辅初当时任国民经济平衡组和统计组的党支部书记、所党总支委员，因而带队前往。与此同时，刘葛年也随着农村医疗队离开了北京。夫妻二人再次分居两地，刚刚建起的家和幼小的女儿只好暂托付给爷爷奶奶照料。

知识分子对科学是敏感的，即使去参加“四清”，董辅初们仍然想研究问题，在中科院经济所坚持了数年的“双周座谈会”在“四清”以后基本上衍变成了有关“再生产问题”的双周专题探讨会议。在这个座谈会上主要讨论三个问题：（1）经济效益；（2）经济核算；（3）再生产。这三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来自于对“大跃进”时期不计成本、不讲效益、违背基本经济规律的事实。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要研究点儿问题实在是不容易。

苏联有一位经济学家叫利别尔曼，当时他就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也要注重“利润指标”。不幸的是，那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发生了争执，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中国指责苏联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利别尔曼的理论理所当然地不为中国所接受，不少